

● 新探索

符号提喻和象征:体育形塑国家形象的连续体

徐春宁¹,何满龙²,张云峰³

摘要 中国早期经历了对现代体育的排斥、被动和主动参与的连续过程,这一过程凸显了中国的左文右武和雪耻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形象;体育与政治的具体关联机制是不同时代的社会价值观都对冠军存在有一种普遍的崇拜认可、对体育符号提喻处理、跃升为传达国家政治行为载体象征符号;体育提升国家形象的具体路径有政治性符码与体育精神的平衡、构建国家、个人的体育话语能力、历史性符码与当下性的平衡。体育象征国家形象具有多重性,随着时代和国家实力的变化,对惯习的体育符号应及时进行调整。否则,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就会出现编码和解码的严重脱节。

关键词 国家形象;竞技体育;表征;奥运会;连续体;提喻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6)04-0042-06

DOI:10.13598/j.issn1004-4590.2016.04.007

Symbolic Synecdoche and Symbolization: Sports Shapethe Continuumof National Image

XU Chun ning¹, HE Manlong², ZHANG Yunfeng³

(1.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aoning, Anshan 114051, China 2. The Sports Department of Anshan Teaching College, Anshan 114005, China. 3. Shenyang Sport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02, China)

Abstract We have studied the mechanism and promotion paths for association between sports and national image based on semiotics and political theories of sport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in the early years, China had experienced the continuous process of rejection to and passive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modern sports, which highlighted China's advocating both fine art and martial art and wiping the disgraceful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image. The specific mechanism for association between sports and politics is: the social values in different times generally worship and recognize championship, and by synecdoche treatment, sports symbols can be upgraded to the carrier symbols to convey a country's political behaviors. The specific paths to enhance the national image via sports are to keep a balance between political symbols and sports spirit, to build the national and individual ability to speak in sports and to keep a balance between the historic symbols and the modernity. Sports, as the symbol of national image, have multiplicity.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times and national strength, the habitual sports symbols should be timely adjusted. Otherwise, a serious divorce between encoding and decoding will appe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national image; competitive sports; characteristics; the Olympics Games; continuum; synecdoche

体育在保持独立性和神圣性的同时,也是其所处社会的高度象征。体育是不同的个人、群体甚至国家在公共场所进行自我表露进而让别人领略到的一种形象。随着体育特别是竞技体育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日益增大,不同国家开始了以体育为平台介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活动。当然在体育与政治发生冲突的时候,进行体育抵制也在所难免。在奥运会的早期,出于

维护国家尊严和主权的考量,我国也以退出奥运会的方式进行政治方面的抗争。在政治介入的影响下,国家间的竞技体育比赛被赋予了一种民族和国家的符号,在很大程度上是本国的精神面貌、国家实力和国家形象的一种映射,进而凸显了其重要性。历史上,中国的奥运情结也颇为久远,在1908年,《天津日报》就刊登了体育界著名的“奥运三问”,传达了中国对奥运梦

收稿日期:2016-04-27

作者简介:徐春宁(1982-),男,青海乐都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训练学与体育社会学。

作者单位:1. 辽宁科技大学 体育部,鞍山 114051; 2. 鞍山师范学院 公体部,鞍山 114016; 3. 沈阳体育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沈阳 110102。

的企盼。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基于多年的举国体制的奥运战略传统,中国以完美的成绩回答了“奥运三问”,以全新的形象向世人表征和诠释了它的过去和现在。习总书记在2014年更是把中国体育强国梦提升到关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高度。当然,国家若不择手段地追求冠军就会出现诸如兴奋剂、打假球等与奥运精神主旨发生严重冲突的行为,有损国家形象。然而本属于单一身体活动形式的体育运动为何与国家形象发生了符号性联系?其背后的机制究竟是什么?当前我国在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过程中,究竟应该如何通过体育平台提升我国的竞争力和国家形象?本文基于体育与国家形象的形塑问题进行理性审视,挖掘其流变特点和背后的关联机制,对体育形塑理想的国家形象进路进行理论性探索。

1 体育与国家形象研究的现有进路

1.1 媒介决定论

以中国知网(CNKI)为搜索平台获取的有关国家形象的研究其主题大多集中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实力,其学科关涉既有体育学又有政治学、传播学,但其切入点却一致明晰地指向新闻媒介的叙事报道和文本分析。从体育传播的媒介方式进行提升国家形象研究的有汤筠、赵爱慧、万晓红^[1-3]。此类有关体育与国家形象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电视、新媒体、中外权威报纸和媒体,对本国和他国在奥运会的表现进行编码和解码比较,在微观层面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大多似乎陷入媒介决定论。

1.2 软实力贡献论

舒盛芳、孙娟、袁大任^[4-6]从体育软实力的概念内涵与分类等进行了研究。其概念界定的逻辑依据是对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的软实力概念在体育中的嫁接和应用。随后有程林林、李登、王忠杰^[7-9]等对提升体育软实力的对策、路径等进行了尝试性的回答。以上研究意识到了软实力对于国家形象的重要性,同时对体育中的软实力进行概念解读,但是大都属于个案性的、甚至是具体策略性的方案设想,对体育软实力提高国家形象的具体机制解释力不够。总之,对体育提升国家形象的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现有研究尽管意识到媒介、体育软实力和国家形象具有相关性,但对其内在机理和机制的研究不够深入,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2 体育与中国形象的连续体变迁

所谓连续体就是表述某事物在时空的变化过程中的激化过程。以现代体育与中国的形象的关系而言,

中国经历了对体育的排斥和被动、主动参与的过程,在不同历史阶段体育兼具提升和贬低国家形象的功能。由于研究者的视角和出发点不同,国家形象的定义侧重也有所不同。管文虎^[10]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具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内涵特性,前者包括物质形态呈现的人口、物产、经济和军事等,后者包括国民的行为、政治、历史传承等精神风貌。总体而言,国家形象就是表述一个国家在特定社会乃至某一时段的、有选择性和有所侧重的概貌。

2.1 古代中国体育的历史性符号:内敛、右文左武

由于中国具有地大物博的自然环境和隶属农耕文明的特点,其国民性格注重内敛、顺乎自然、合乎中庸平和。在农耕文化和中庸思想的熏陶下,中国的体育活动以养生、太极拳为主,甚至把那些本来具有竞争性和对抗性的射箭和蹴鞠分别改造成实施礼教的工具和类似于杂耍性质的表演项目。在沿袭千年重文轻武的文化影响下,国人形成了以文弱为美称的身体文化观。在清政府时代,国人之身体素质每况愈下,最早指涉国家改革落后的“东亚病夫”进而指向了国民的身体孱弱。随后武术自然成为与西方殖民主义进行斗争的武器,于是对民族英雄——霍元甲进行了夸张化的文本诠释。

2.2 奥运梦凸显了中国改革的历程和形象

在和欧洲人接触以前,中国一直以高贵、文明、文化自居,把世界其他民族都称为蛮夷。在此种文化的熏陶下,中国对西方的现代体育不屑一顾,整体是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演变过程。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洋枪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传教士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强势性的植入改造,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从此与中国发生了关联。但此时,国人在西方竞技体育的开展中完全没有话语权,以传教士为主体的域外力量起主导作用。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前,体育竞赛规则,比赛中术语以及比赛器材等全由外国人控制。由于缺乏适宜的社会条件,体育经费筹措乏力,西方竞技体育在中国的开展也举步维艰。域外势力主导中国的竞技体育活动这一趋势愈演愈烈,在1923年的东京亚运会上,以美国人葛雷作为中国的代表登台讲话事件作为导火索,国人开始反思体育的主权问题。据记载^[11],在夺回洋人手中的体育主权呼声的背景下,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此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为了骗取世界的承认,日本侵略军竟然以所谓“满洲国”的伪造国家身份致电国际奥运会,计划派出刘长春、于希渭代表“满洲国”参赛。最后被中

国识破,中华全国体协不得不改变原来只派观察员的计划,历史上第一次派出刘长春作为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此阶段,虽然中国参加奥运会是被动的,但国人在反思国家失利的过程中达成了“强国先强种”的共识,逐渐认同了西方竞技体育文化。这一切都为国人后续的对奥运会的关注并采取了参与性的实际行动做了前期的铺垫。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旗帜鲜明地表明中国代表权的问题,尽管后续的成绩不好,但是却向世界表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参加奥运会的合法权利。随后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粗暴地对台湾加以吸收而不考虑“一个中国”主权的申诉,为了反击“两个中国”的阴谋论,新中国最后不得不退出奥运组织。在随后举国体制下,我国乒乓球、排球等优势运动项目逐渐在竞技成绩上获得突破,体育开始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在奥运会大舞台中也赢得一席之地,在奥运会的金牌榜上也位居前列,从体育大国开始向体育强国迈进。此时竞技体育的成绩完全代表了中国的新的国家形象,萨马兰奇甚至在洛杉矶奥运会后在体育报上撰写了《巨人醒了》一文,认为我国竞技体育成绩的突破改写了外界对传统的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

3 体育表征国家形象的机制和动因

3.1 冠军需要及其意蕴

冠军是我们文化的象征,同时它也可以让我们领略到我们可能的样子。社会需要冠军,因为它发挥着为自己为国家取得成功的显在功能和潜在功能。冠军体现了那些被社会最看重的理想化的产物,为人们提供灵感、动力、方向和生活的意义。此外,作为英雄还具有整合社会的功能,以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把人们紧密地团结起来。纵观竞技体育的历史,古代奥运会就存在城邦国家青睐和宠爱冠军的传统。冠军会坐四轮战车环绕家乡,受到平民们的夹道欢迎并被顶礼膜拜。除了平民以外,国王也会为冠军举办庆功宴并给予奖赏。

这与现代奥运会上各个国家对冠军的重视程度如出一辙。比如朝鲜柔道运动员桂顺姬在获得冠军归国时,十多万市民在平壤夹道欢迎,桂顺姬还被政府授予了代表最高荣誉的“金日成奖”及“劳动英雄”奖章。现代运动员在备战和获胜后都会获得和国家领导人面对面鼓励或慰问的机会。动用国家财政,给予运动员丰厚的奖励和特权,刺激冠军成绩的输出。国家为了吸引那些具有冠军潜力和竞争力的运动员选手,进行高回报的物质奖励,甚至诱惑别国的优秀选手改变国籍。冠军获得国家 and 人们的认同,说明不同时代的社会价

值观都对冠军存在一种普遍的崇拜认可特征。

3.2 体育内在的符号属性特征

符号最早是由索绪尔在研究语言的时候提出的,指的是语言的能指和所指,随后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符号学的理论,但隶属于符号学的社会规约性和片面性等基本特征依然没有改变。体育除了具有身体实践特征以外,在社会学中也是一种符号的实践具有符号的意蕴特征。其实,众多的符号研究者早就认为体育具有明显的符号学特征,应当从符号学加以研究。依据符号学的分类,体育从属于非语言符号的身体符号、行为符号、象征符号。翟明安^[12]认为,竞技属于明显的行为象征符号。

3.2.1 体育运动诞生发展的内在社会性符号

最早隶属于无功利性的宗教祭祀身体活动仪式就深深地打上了社会符号特征,对种族、性别,甚至是社会地位的一些要求做了苛刻的规定和限制。把本来纯身体动作如跳高等身体行为与成年礼、祈求土壤肥沃和丰产紧密联系。在历史上对于参加何种体育活动形式,都进行了社会身份地位以及性别和宗教的区隔。即使在现代,体育运动作为固化社会身份等级的隐性符号依然发挥着作用,那些所谓的高尔夫等贵族运动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依然是一种奢侈消费。

3.2.2 体育运动竞赛规则的符号规约性和任意性

体育竞赛的顺利开展得以明晰规则进行量化和维护,但是考察体育竞赛规则的发生演变以及认同就会发现体育竞赛规则符合符号学特征的所指任意性。在球类运动中,对有效的处理方式进行了不同的要求,要求落地前击打、落地一次后才能击打、落地前和落地后均可击打等。即使同一运动项目在发生和流变的过程中其规则的能指也在进一步扩大。以篮球规则为例,早期的篮球运动不允许有身体接触和对抗,后来发展为强对抗的身体活动。对同一体育运动行为,不同国家的规则处理方式也不相同,以篮球的罚球为例,朝鲜篮球规则规定若运动员罚球不仅不加分还要扣分,与国际篮球规则惯例严重相左。对运动项目诞生的社会性和不同运动项目竞赛规则的要求以及同一项目的自身规则改革考察发现,体育运动项目具有内在的社会符号属性,其规则具有符号学能指任意性的属性特征。

3.3 由符号到象征

体育虽然具有了符号的特征,但是如何与政治以及国家的形象进行了关联?人们早就对体育场域究竟如何与政治场域的关联进行了反思。据张欢华^[13]的研究,奥威尔在上世纪40年代就质疑所谓的体育精神:跑步、跳跃和踢球真的是对一个民族的品德素质的检验吗?如果它们不是,何以承载民族、国家荣誉的

巨大意义?对这一问题的挖掘要进一步探究符号与象征的关系。一方面,体育可以化解和隐喻由于人类的集体认同感所引发的打斗甚至战争行为,同时也是对人们世俗生活的一种调节,其符号的实际价值远远大于其纯体育的符号价值。另一方面,符号是意义的表现形式,多以外显的以及可感知的具体事物表现出来,而意义是符号所要反映的内容,属于深层结构。此处符号的意义即为象征,象征一定是基于某些特殊的符号,二者既相互联系又可相互转化。特纳^[14]认为象征是“通过联想、相似或习俗代表另一样东西。有些虽属于物质性的东西、事件,但都能表达琢磨不透的意识形态观念”。由此可见,象征是通过种种外显的或可感知的东西来暗示、反映或传递某些事物的特定内涵方式。然而符号要跃升为象征要通过提喻、集体性重复和组合使用等方法。

提喻,也称举偶法,是借助于部分相似的借代,在体育与国家形象的关联中突出地表现为部分和全体互代。索绪尔^[15]说:“史学家在叙述两军交锋时也介绍两位首领之间的战斗……这样首领A与首领B的决斗就不可避免地成了象征。”在大型体育赛事中,某个运动员的胜利经过提喻就转化为民族、国家甚至洲的胜利。例如,奥运会的乒乓球比赛中,中国队赢了,就是以国家名称中国代替了仅有几个运动员和教练员组成的小团体。刘翔在奥运会跨栏中获胜就被上升到中国、黄皮肤人种、亚洲的胜利。

主题复现和集体重复使用。有意让一个主题在短时间内多次重复表达,经由个体到群体、群体到个体的螺旋式传播,最后就形成了集体重复使用,获得更深远的象征意义。每逢大型体育赛事,在媒体崇拜的强力介入下,赛事吸睛度空前高涨。权威媒体宣传、个体参与和群体区隔,那些伪球迷也被卷入,假装看球,假装疯狂,在此过程中,伪球迷的身份有时候会发生极化转换,产生集体无意识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把本来不相关的一组符号进行了组合,并成为传统。比如世界杯期间,啤酒、国旗、狂欢、球迷滋事本来隶属于不同的情境,却进行了跨界混搭,形成一种文化传统。比如,英国的流氓足球文化,每逢世界杯期间,一些喝得醉醺醺的球迷就走上大街任意爆粗口,摔酒瓶甚至做出严重的破坏性行为。

3.4 体育政治象征理论

象征符号传达政治行为,所有的社会行为和社会权力关系都是用象征符号来表达的。英国著名人类学家 Abner Cohen 分析了政治行为与象征符号之间的动态依附关系,揭示了集象征性和政治性双向度的政治人的象征本质,进一步阐发了在正式的政治组织中

起作用的一些非正式的政治群体^[16]。象征符号的多意性和多功能性使得该符号能唤起的情绪越发激烈。在象征符号的选择上,Edward Sapir 提出国旗、旗语等隶属于指涉性象征符号^[17]。利奇^[18]认为:“符号并非孤立出现,某个符号总是体现为一组对比性符号的成分。”象征符号被人们赋予象征意义的重要因素是它们与本语境的其他象征符号对比和组合时才发生作用。指涉性象征符号往往是一组的,比如大型体育赛事的颁奖仪式中要升冠军所在国的国旗,奏唱冠军所在国的国歌,且冠军、亚军和季军所站的颁奖台高度也不一。正是通过对比方式,指涉性象征符号才得以和政治发生关联。体育作为政治的象征符号其功能主要是给予政治合法地位、建立社会秩序表征和彰显本国实力。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象征资本理论,是用象征手段维护政治声誉或威信的积累策略的现象。从以上有关政治、体育、象征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不同形式的体育活动都具有凸显本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在这一过程中,分别采用了可识别的能代表本国形象的一些象征链组合。纵观历史上的远东亚运会和奥运会,可以发现竞技体育的竞争象征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争斗和表达。无论是中国体育主权的重新获得,还是美苏在奥运会上的互相抵制,都是通过政治上的排他性标识而得以存在。高水平的体育竞技能力象征着国家、民族乃至政治制度的整体竞争实力和体制的优劣。

4 体育提升国家形象的路径

4.1 政治性符号与体育精神的平衡

尽管竞技体育象征符号能够表现政治行为和意识形态,但是竞技体育象征符号并非是政治行为的机械反映或表征。一味地追求竞技体育的政治象征功能,有时候会发生极化效应,反而有损于国家的形象。当体育冠军的政治符号失衡时,就会发生违反体育竞技规则伦理和公平竞赛精神地情况。奥运史上著名的“兵败汉城”使中国的国家形象蒙羞,在竞技体育成绩低迷的同时,举国上下民众对金牌的非理性狂热以及兴奋剂事件至今都是外界曲解中国竞技体育的一个逻辑起点。田径和游泳是奥运会最基础的项目,但国人在最初几届奥运上田径和游泳的成绩一直不是很理想。为了金牌,在汉城奥运会以及广岛亚运会上分别有11名和7名中国游泳选手服用兴奋剂。在伦敦奥运会上,国外媒体对中国16岁的游泳选手叶诗文进行了质疑和诘难,这也许是国外对中国游泳选手服用兴奋剂惯例的原象偏见。尽管体育精神推崇参与大于胜利,但是在实践过程中金牌至上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洛杉矶奥运会上运动员的优异表现,奠定了人们对汉城延续高潮的基调,在汉城奥运会失利后,举国上下笼罩着谴责甚至咒骂运动员的氛围。连党政大报都在头版进行报道,李宁的表现和失误被戏谑为“不知羞耻”、“体操亡子”,更有观众体现在行动上,赛后辽宁观众给李宁寄了根绳子进行羞辱。失利的跳高名将朱建华遭遇也是如此,尽管在奥运会上获得了一枚铜牌,但其回国后遭到了人们的唾骂,其家中的玻璃也被人砸了,因此国外媒体针对李宁和朱建华的遭遇认为中国在奥运会上是一个“输不起的民族”。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中国羽毛球队为了夺金概率的提高而与韩国队进行消极比赛,亵渎了奥林匹克竞技精神进而有损中国体育的国家形象。尽管这是体育规则与道德的碰撞,但是比赛现场观众嘘声一片,因为奥运会传递的不单单是金牌,更是体育追求卓越这一精神的传递。

4.2 构建体育话语能力的建设

尽管在北京奥运会等一系列大型赛事上中国实现了竞技体育成绩的大幅度提升和突破,然而在一些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大球类,特别是在足球成绩的影响力上依然很薄弱。三大球和田径在世界舞台的竞技能力现在是制约我国实现体育强国的一个重要障碍。为此在竞技体育发展方式上要改变由往简单地追求金牌数量向金牌质量转变。向足球等含金量高的运动项目发起冲击,进一步提升本国体育实力以便彰显体育强国形象。在全面提高竞技能力的同时也要提高体育的话语权,因为竞技体育的成绩与体育话语权之间并非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就如符号的任意性一样,只有拥有制定规则的话语权才能有影响力。体育也是如此,纵观真正的体育强国,他们在追求竞技体育成绩的同时更关注体育话语权,因为后者关乎到本国的文化传播。1936年中国传统武术首次在奥运会进行了刀、叉等太极拳的表演。与西方竞技体育相比,中国武术在奥运会中属于低势能文化,武术从此开始了它基于西方竞技体育逻辑下的改革。传统武术进入奥运会只是为了向全世界更好地宣扬中国传统武术的“天人合一”、重精神修炼等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文化特质。然而在武术入奥的过程中我们把武术的本质进行了肢解,仅仅传播竞技层面的武术,把武术异化为类似于体操和艺术的表演。为此在中国武术的进入奥运会的道路上,以及武术对外传播和交流的过程中一定要基于武术内核,不能以西方文化主流形态的游戏规则为准绳。为了武术进入奥运会而削足适履的做法不仅起不到世界认同武术的作用,还有损本国对传统文化的自觉和自信。除此之外,国家要尽可能多地参与西方主导的大型体育赛事的运作。现代体育的国际

性组织多为西方人控制,在体育规则制定与修改、市场开发等关键岗位和领域中国依然处于失语状态。除了国家在竞技体育中的话语以外,作为个体的运动员也要有体育话语。以往把运动员固化为国家金牌机器的制造者,甚至在获胜后首先要感谢谁都进行了文本的前期设置,对外界而言,这象征了对运动员人本主义关怀的缺失。李娜模式的成功一方面在于她在西方主导的竞技舞台赢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也归于她个人话语权的争取。无论是在训练还是外出比赛,她获奖后的感言都体现了国家对她个人话语的认可 and 包容。当2013年李娜获得世界网球冠军时,她的照片竟然4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一版位置。显然李娜形象象征了中国成为体育强国的又一筹码,其媒介形象的象征意义超越了单一的奥运会金牌的获得。

4.3 历史性符码与当下性的平衡

自古以来,中国就呈现出文化久远和强盛的大国形象,但这种良好形象被晚清封闭、落后、愚昧的形象所终结。在半殖民半封建化的过程中,西方竞技体育强势植入,从此中国文化特有的“面子工程”就与竞技体育发生了耦合。在这一过程中,客观地说竞技体育的成功有助于振奋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感,也促进了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乒乓外交和20年长盛不衰的成绩、排球五连冠这种突破性的胜利确实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生产上给都处于困境,综合实力薄弱的中国带来了一些抚慰、自信和骄傲。但是唯竞技论会对竞技主体的人造成一定的困惑和异化。郎平^[19]在自传中回忆:“那时候打球已经完全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行为,而是国家大事,我自己都不属于自己。”谢琼桓^[20]认为:“中国人正在超越百年的民族悲情,开始具有正常的大国国民心态,这种心态对中国崛起和在国际舞台上担负责任具有深刻意义。”心态调整正是体育本质的回归,过多的体育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应该被弱化。当前中国在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过程中,必须完善举国体制,克服原有的制度性弊病,转变体育发展方式,切实有效地构建大众体育的发展。大众体育发展也是体育强国的一个重要性指标,关注大众体育锻炼和健康权益,重塑多数人的体育新形象。体育权利的保障是人权具体的体现,这也是国家进步和责任大国的符号象征。俄罗斯虽然在北京奥运会上金牌榜落后于中国,但是不能否认它体育强国的地位。俄罗斯的法律体系从不同角度规定了公民享有体育的基本权利,国家在保障方面很好地平衡了大众体育和代表本国形象的竞技体育这两者的关系。体育发展方式内嵌于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其体育需求的重心要进行相应的匹配,要考量历史性和当下的

需求,不能有失偏颇,拉大体育参与的社会距离。

5 结语

体育与国家的形象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表征实践过程,既有意象符号、书写符号和真实符号。体育与国家形象发生关联的机制包括不同社会对冠军的需要,体育符号经过提喻处理后跃升为象征符号,而象征符号是传达国家政治行为的载体。舒盛芳^[21]在考察日本、美国、德国和前苏联的体育与政治后发现,体育的崛起成为大国崛起的信号和象征。竞技体育能力内嵌于国家的形象,片面化的体育竞技感知能放大国家象征意义。中国竞技体育早期的优先崛起和“赶超型”战略消除了国家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形象。体育象征国家形象具有多重性,随着时代和国家实力的变化,不能期望惯习的体育符号与国家形象完全匹配,应及时对体育象征符号进行调适。否则,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就会出现编码和解码的严重脱节。体育提升国家形象的具体路径有政治性符码与体育精神的平衡,构建国家、个人的体育话语能力、历史性符码与当下性的平衡。

参考文献:

- [1] 汤筠冰. 被观看的中国国家形象——北京奥运会的视觉文化传播研究[J]. 体育与科学, 2010(2): 20—24.
- [2] 赵爱慧. 伦敦奥运会报道与国家形象塑造——以《人民日报》、《中国体育报》报道为例[D]. 济南: 曲阜师范大学, 2013.
- [3] 万晓红. 奥运传播与国家形象构建: 以柏林奥运、东京奥运以及北京奥运为样本[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 [4] 舒盛芳. 体育软实力的基本特征及其启示[J]. 体育文化导刊, 2008(2): 67—69.
- [5] 孙娟, 付常兵. 试论体育软实力[J]. 体育文化学刊, 2009(6): 6—9.
- [6] 袁大任. 强化中国体育软实力可选方案[J]. 体育文化导刊, 2009(1): 1—2.
- [7] 程林林. 发展国家体育软实力的思考——基于文化交集和通约的视角[J]. 体育与科学, 2012(5): 1—6.
- [8] 李登. 体育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及其特性研究[D]. 武汉: 武汉体育学院, 2015.
- [9] 王忠杰, 崔国文. 体育软实力的逻辑层次及提升路径[J]. 体育学刊, 2013(5): 29—32.
- [10] 管文虎. 国家形象论[M]. 北京: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0: 23.
- [11] 任海. 奥林匹克运动[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5: 391—392.
- [12] [16] [17] 翟明安. 象征人类学理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8, 208, 109.
- [13] 张欢华. 作为符号实践的体育[J]. 社会, 2003(5): 60—62.
- [14] 维克多·特纳. 庆典[M]. 方永德,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8.
- [15] Ninth Edition.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11: 366.
- [18] 埃德蒙·利奇. 文化与交流[M]. 卢德平, 译. 华夏出版社, 1991: 16.
- [19] 郎平. 激情岁月[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99.
- [20] 谢琼桓. 论北京奥运会后中国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1(11): 5—9.
- [21] 舒盛芳. 大国体育崛起及启示——兼论中国体育“优先崛起”的战略价值[J]. 体育科学, 2008(1): 76—81.

(上接第58页)

- [8] 俞正樑, 等.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273—274.
- [9] 凌平, 南音.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与中国的和平崛起[J]. 体育与科学, 2006(1): 10—13.
- [10] 任海军, 吴黎明. “贺喜”索契冬奥, 公共外交新创举[EB/OL]. [2016-02-20].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2/07/c_119234505.htm.
- [11] 曾伟, 谭洁羽. 解读习近平“点穴式”外交有何特点[EB/OL]. [2016-02-20]. <http://news.sohu.com/20140826/n403796949.shtml>.
- [12] 刘盼盼, 刘纯献, 冉祥华. 习近平主席索契冬奥会之行看体育与外交的相互融合[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4(12): 1—6.
- [13] 刘玉亮, 张勤. 我国竞技体育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J]. 体育文化导刊, 2012(11): 5—8.
- [14] 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 当中国改变世界[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5: 28—29.
- [15] 国家体育总局. 关于加强国际体育组织人才培养的意见[EB/OL]. [2016-06-13]. http://htzl.china.cn/txt/2005-06/13/content_5888539.htm.
- [16] 刘冠楠, 陈刚. 论公共外交视域下中国体育外交的任务[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2(11): 16—20.
- [17] 朱迪斯·戈尔茨坦, 罗伯特·O·基欧汉. 观念与外交政策: 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8—16.